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 中古叙事文学研究

刘湘兰 著

Zhonggu Xushi Wenxue  
Yanjiu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 中古叙事文学研究

Zhonggu Xushi Wenxue Yanjiu

刘湘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古叙事文学研究/刘湘兰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9003-6

I. ①中… II. ①刘… III. ①中国文学:叙事文学-文学研究-中古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1210号

书 名: 中古叙事文学研究

著作责任者: 刘湘兰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9003-6/I·234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swsz@yahoo.com.cn](mailto:pkuswsz@yahoo.com.cn)

印 刷 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17印张 237千字

2011年7月第1版 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4.00元

---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mailto:fd@pup.pku.edu.cn)

## 总 序

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都堪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她的历史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山大学(初名广东大学)同样悠久。鲁迅、郭沫若、陈中凡、方孝岳、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等名字让我们回忆起来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后人来说,学科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是压力。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固然占了“便宜”,但也像是站在海拔极高之处,每一步攀升都异常艰难。仰望前辈,如何既继承学术传统又有所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当今,“独创”二字已经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语。不过,各个领域不同,不同学科有异:有些贵在创造发明,有些偏重发掘发现。有些可能是“独创”,有些则只能是“独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似乎难以创造发明自诩;形态上的“新”与“旧”也难以用来判断学术价值的高下。所谓“创新”,未必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抛弃。按照清代学者纪昀评点《文心雕龙》的说法,在历代文坛上,“新声”可能成为“滥调”,“旧式”也可能成为“新声”。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在传统断裂的时代,挖掘与发现传统文化资源,也是颇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学就是传统的学术资源。“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自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被人所淡忘。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和演绎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套用西方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这一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 21 世纪的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要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受到学界认可的学科方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就是近年来我们凝聚力量、重点建设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方向之一。同仁们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大量论文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为了及时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是开放与持续的。作者除了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有其他高校教师与学界同仁。所收成果以中国文体学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不断地吸收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到本丛书中来，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发展。

吴承学

2010年12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 序

湘兰女弟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古叙事文学研究》就要出版了,她打电话来,希望我给书写篇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她。

湘兰考入南京大学,随我读博士学位,是八年前的事了。不过,我认识她则是在 2001 年的秋天。记得有一次我去上课,教室的前排座位上,增加了两位很瘦弱的新学生,也没太留意。课后,她和另一位新同学就留下来,怯怯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想报考我的博士生。受之于师,传之于弟子,我当然表示欢迎,并鼓励她好好准备。转年夏天,她如愿录取到南大中文系,但几乎同时,在她生活中却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故,而这件事对湘兰的打击,无疑是极为沉重的。但她还是按时入学了,当然依旧是很瘦弱的样子。我们都希望她能尽快地走出这一生活的阴影。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平时与其他同学一样,一起来上课,一起读书和讨论问题,也与大家一起出游,强颜欢笑,背后常常是以泪洗面。我曾经很担心她这样是否会影响学业,但她终于走过来了。

湘兰是湖南人。湖南多山地。如刘师培先生所说:“山国之地,地土硗瘠,阻于交通。故民之生其间者,崇尚实际,修身力行,有坚忍不拔之风。”钱基博先生也说,此地“崇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一方水土于一方民风的形成和人之性格的熏陶,实有难以具说而又涵养至深者。在我的印象中,湘兰就是一位表面上很柔弱但性格十分坚强的女生。这种性格也影响着她的学术研究。

湘兰这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中古时期的叙事文学。其所涉及

的范围,相当广泛。凡子、史、佛、道,皆在其考察范围之内。加之此时的子、史,往往浑融未分;内典与外典,也常常混淆。故线索众多,头绪纷杂,研治不易,需要足够的细心和耐心。湘兰恰有此细心和耐心。她仔细地去寻检这一时期的史传、史志、佛道二藏等文献资料,从最基本的文献和概念的考察与梳理入手,于是,史传和小说创作兴盛的原因、小说概念内涵的变化,小说与史传、史志、杂传、佛道二藏的离合、异同关系等等,这些很容易混杂的问题,不但在湘兰的笔下,较然分明,而且,一些以往不为人注意的问题,也被揭示出来。比如,她注意到《宋书·百官志》和《晋书·职官志》等书的记载:“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沿此线索,她对杂传作者的身份和史官重文章之才的风气进行了考察,遂得出两晋杂传和小说的兴盛与史官制度有着密切联系的结论。这确是发前人所未发。

我们一向以为,方法是不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只要这种方法有助于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都不妨拿来为我所用。困难是如何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从具体问题出发,将理论方法的运用与作家作品的研究结合起来,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生搬硬套。湘兰此书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既然是叙事文学,那她运用西方叙事学的理论,来分析、比较中古时期史传、史志和小说叙事的视角、结构、类型,探讨佛道二教的时空观对小说叙事思维和方法的影响等,就都应当是可行的。像她在书中讨论“汉武故事”系列的演进,根据修辞性叙事的理论,从反讽与象征两个角度解读《汉武帝内传》中的人物关系,以揭示传中汉武帝形象的道教色彩;在《燕丹子》与《史记·荆轲传》的叙事比较中,抓住二者在叙事主题、视角和结构上的差异,说明不同的文体对叙事手段的不同要求;通过对《高僧传》和《神仙传》中的奇异和“历练”情节的分析,指出其创作思维和“局限视角”叙事的文学色彩和影响,等等,都视野开阔而论述细致深刻,显示出很强的文学感悟力和理论思辨能力。

湘兰说自己是山的女儿,幼时常与小伙伴们一起,欢叫着跑进山里,在尽情嬉戏和辛勤劳作之后,提着装满了山的果实的竹篮,交给等待着她



们回家的母亲。现在,早已走出大山的她,经过多年在学术园地里的辛勤耕耘,开始收获那沉甸甸的果实,收获生活对她的赐予了,作为看着她一路走过来的我,真是由衷地高兴。我祝愿并相信她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收获,山外有山,只要她始终保持着那种对学术的好奇心,不断地、自信而坚定地往前走。

巩本栋

庚寅夏于水木秦淮

# 目 录

|                           |         |
|---------------------------|---------|
| 序                         | 巩本栋 (1) |
| 绪 论                       | (1)     |
| 第一章 中古史传、杂传与小说之文献考察       | (13)    |
| 第一节 史传内涵之界定               | (13)    |
| 第二节 杂传内涵之界定及文献考察          | (20)    |
| 第三节 两晋史官制度与杂传的兴盛          | (30)    |
| 第四节 小说内涵之界定及文献考察          | (42)    |
| 小 结                       | (60)    |
| 第二章 汉代小说叙事之个案研究           | (63)    |
| 第一节 汉代小说的文献考察             | (63)    |
| 第二节 “汉武故事”系列的修辞性叙事        | (67)    |
| 第三节 《燕丹子》与《荆轲传》叙事比较       | (85)    |
| 小 结                       | (93)    |
| 第三章 汉唐间的五行志与志怪小说          | (95)    |
| 第一节 共同的思想观念与文化背景          | (96)    |
| 第二节 五行志与志怪小说的交集           | (101)   |
| 第三节 五行志与志怪小说的分化           | (104)   |
| 小 结                       | (111)   |
| 第四章 六朝小说与唐修《晋书》叙事比较       | (113)   |
| 第一节 历代学者对唐修《晋书》取材于六朝小说的评价 | (115)   |
| 第二节 唐修《晋书》对六朝小说的采择与编排     | (125)   |
| 第三节 六朝小说与唐修《晋书》叙事之整体分析    | (129)   |

|      |                      |       |
|------|----------------------|-------|
| 第四节  | 志人小说与唐修《晋书》之叙事       | (135) |
| 第五节  | 志怪小说与唐修《晋书》之叙事       | (141) |
| 小  结 |                      | (148) |
| 第五章  | 宗教思想对杂传与小说叙事之影响      | (151) |
| 第一节  | 佛教“生死轮回”时空观对叙事思维的拓展  | (153) |
| 第二节  | 中古叙事文学中的梦幻情节         | (163) |
| 第三节  | 道教“洞天福地”观念对六朝叙事文学之影响 | (174) |
| 第四节  | “异形”叙事情节之分析          | (179) |
| 小  结 |                      | (184) |
| 第六章  | 释道类杂传叙事分析            | (186) |
| 第一节  | 《高僧传》叙事整体分析          | (188) |
| 第二节  | 《高僧传》“神异”情节的叙事分析     | (195) |
| 第三节  | 《神仙传》叙事整体分析          | (201) |
| 第四节  | 《神仙传》“历练”情节叙事分析      | (208) |
| 小  结 |                      | (213) |
| 第七章  | 中古叙事文学的人物类型分析        | (215) |
| 第一节  | 孝子形象分析               | (216) |
| 第二节  | 女性形象分析               | (234) |
| 小  结 |                      | (246) |
| 结  论 |                      | (248) |
| 参考文献 |                      | (251) |
| 后  记 |                      | (259) |

## 绪 论

本书所论及的“中古”，主要指汉魏六朝时期，由于历史、文学发展的延续性，论述的范围会延伸到初唐。中古时期，中国的叙事文学开始发展，并取得了较大成就，具有鲜明的个性，充分显示了中古时期的历史特征。中古时期又是中国古代“文”、“史”观念逐步分化、逐渐明朗的时期，这个特征在历史著作与小说之间的融合、交糅、分化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唐代以后，小说与历史著作的文体特性、文体功能及价值已比较明朗，彼此之间的交集也较少。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与文学思想日益发展成熟的重要表现。因此，本书谈论中古时期的叙事文学，以史传、杂传、小说为核心，立足于儒、释、道文艺思想的发展，对这一历史阶段中的典型作品进行叙事分析，以期深入揭示文学与史学的发展规律。

### 一

中古是中国叙事文学的初步发展期，史传、杂传与小说是这时期叙事文学的主要代表。据《隋书·经籍志》（下文皆简称为《隋志》）史部所载书目可知，中古时期的史学非常发达，修撰了大量的史书与杂传。而“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修撰，则代表了我国古代历史著作的最高水平。同时，《隋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了大量情节结构比较复杂，具备较强叙事功能的小说。如美国学者浦安迪所说：“先秦寓言故事严格讲，不能称为小说，汉代小说又多伪托，而六朝则为小说真

正风行的时代。”<sup>①</sup>由于中古时期基本上是文人修史,所以当时的史传与杂传带有很强的文学性;而小说作者在记载、改编收集来的奇闻逸事时,反复强调的是“实录”,具有史的性质。而且,小说的兴盛与史学的发展有很大关系。明代焦竑在其《国史经籍志》卷三“传记类”的序言中说:“至于流风遗迹,故老所传,史不及书,则传记兴焉。如先贤、耆旧、孝子、高士、列女,代有其书,即高僧、列仙、鬼神、怪妄之说,往往不废也。”<sup>②</sup>焦竑“传记类”著录的书目,包含了《搜神记》、《异苑》、《冥祥记》、《搜神后记》之类的小说,可见他所说的“史不及书,则传记兴”,事实上是说史书所不暇或不屑记载的内容,导致了传记与小说的兴盛。中古文人注意到正史弃而不用的材料,同样具有史学或文学价值,并加以重新利用,由此促使了杂传与小说等文体形式的兴盛。历史发展到六朝时期,文、史观念逐渐明朗。这就是为什么六朝文人撰修的正史中排斥了许多离奇荒诞的内容,而在小说的创作中却展开了充分的想象力。在这种文、史观念融而未分、融而渐分的过程中,中古史传、杂传与小说三者之间存在许多息息相关的联系。这正体现了中国叙事文学初步发展的特点。

对史传文学进行研究,首先必须梳理“文”与“史”的关系。涉及这方面的著作很多,其中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详细论述了“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的发展过程。<sup>③</sup>在学术界,史传、杂传一般属于史学范畴,多部《中国史学史》对中古史学繁荣发展的原因作了详细阐述。<sup>④</sup>周一良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论及六朝史书的语言文字问题,认为六朝史书的某些语言特点有待从文学角度研究史学著作的人来判断;另外,其《略论南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的特点》等论文皆对六朝史学的独特性有精辟独到的见解。<sup>⑤</sup>

①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② 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三“传记类”,《续修四库全书》第916册,第364页。

③ 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④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朱杰勤:《中国古代史学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王树民:《中国史学史纲要》,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版。

⑤ 以上诸文皆收入《周一良集》第一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当今学术界,从文学角度研究史传、杂传的成果不少,程千帆先生《先唐文学源流论略(四)》、韩兆琦《中国传记文学史》、李祥年《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均对中古时期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详尽论述,郭丹《史传文学》、张新科《唐前史传文学研究》等对唐前史传文学的纵向发展进行了系统研究,作出了较大成绩。然而,学界对史传、杂传与小说三种文体进行横向比较研究,则显得较为薄弱,如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对汉魏六朝的杂传进行了全面疏理,其重点在文献上的考证、辑佚与整理,对杂传文学性的论述显然不够深入。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最先勾画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历史,其中多有真知灼见,深刻影响了后代学者对古代小说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古代小说的研究成了学术界一个热点,研究方法视角较之前辈有很大的拓展。学者从文学、史学、美学、宗教等各种视角对古代小说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如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陈谦豫《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等等。

## 二

小说与宗教的关系是小说研究者关注的重点。特别是东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土,带来了大量新鲜的思想及生命价值观念。这些思想与观念体现在东传的佛经里。佛经里充满想象力的新奇故事,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文人的思维,犹如一阵清风吹拂在中国文学的园地里,催生了无数让人惊喜的文艺之花。

佛教对我国叙事文学的影响,首先体现在佛教的传入拓展了我国叙事文学的主题,丰富了叙事题材。这是历代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早在梁代慧皎作《高僧传》时,就意识到六朝志怪小说中多含有佛教内容。其《序》曰:“宋临川康王义庆《宣验记》及《幽明录》、太原王琰《冥祥记》、彭城刘俊《益部寺记》、沙门昙宗《京师寺记》、太原王延秀《感应传》、朱君台

《徵应传》、陶渊明《搜神录》，并傍出诸僧，叙其风素。”<sup>①</sup>其友王曼颖给慧皎的信中，也提到《高僧传》与其他作品的关系，说：“晋史见舍，恨局当时；宋典所存，颇因其会。兼且搀出君台之记，糅在元亮之说。感应或所商榷，幽明不无梗概。”<sup>②</sup>王曼颖对《高僧传》的史学价值进行了肯定，揭示了正史与佛教的关系，并对各家志怪小说作了简明分析，以突出《高僧传》的创作成就。唐代段成式也从叙事题材的角度论及六朝志怪小说所受佛教之影响，其《酉阳杂俎》记载吴均《续齐谐记》中“鹅笼书生”事，云：“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杖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sup>③</sup>说明吴均《续齐谐记》取材于《譬喻经》。鲁迅对此类故事的承传做了更精辟的论断，他说：“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sup>④</sup>钱锺书分析此类故事，广泛征引佛经，认为此“固释典常谈”<sup>⑤</sup>。他还认为《笑林》中“不识镜”故事也滥觞于汉译佛典《杂譬喻经》。<sup>⑥</sup>

中国叙事文学除在题材与主题方面深受佛教影响外，佛教的传入也有助于中国叙事文学体裁的成熟。前人对此也多有论著。如刘熙载在论及文体与文风的演化时，说：“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sup>⑦</sup>梁启超分析佛典对各种文体的影响，认为“我国近代之纯文学——若小说，若歌曲，皆与佛典之翻译文学有密切关系。……若《华严》、《涅槃》、《般若》等，其尤著也。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

① 慧皎：《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 1992 年版，第 523、524 页。

② 同上书，第 552 页。

③ 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047 册，第 797 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37 页。

⑤ 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765 页。

⑥ 同上书，第 751 页。

⑦ 刘熙载：《艺概》卷一《文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9 页。

靡不心醉于其词绩。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诌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我国自《搜神记》以下一派之小说,不能谓与《大庄严经论》一类之书无因缘。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梦》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甚多。即宋元明以降,杂剧传奇弹词等长篇歌曲,亦间接汲《佛本行赞》等书之流焉。”<sup>①</sup>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云:“观近年发现之敦煌卷子中,如维摩诘经文殊问疾品演义诸书,益知宋代说经,与近世弹词章回体小说等,多出于一源,而佛教经典之体裁与后来小说文学,盖有直接关系。此为昔日吾国之治文学史者,所未尝留意者也。”<sup>②</sup>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则认为六朝志怪小说之所以如此发达,与佛教的传入有很大关系,他说:“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的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sup>③</sup>可见,佛教传入对我国叙事文学的各种体裁,如小说、歌曲、杂剧、传奇和弹词等的结构、行文、主题、思想,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佛教的盛行,六朝时期出现了大量僧传,《隋志》史部杂传类收录了僧传共有十三部之多。由于僧传所特有的宗教性质,其叙事充满了神奇的想象、优美的辞章,情节曲折而生动,成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关于佛教对中国叙事文学影响研究的成果也比较多,专题论文有白化文《三生石上旧精魂——汉文学对通过佛教经典传来的古代南亚次大陆文学素材的使用与扬弃》一文,独辟蹊径,反言中国叙事文学如何主动对佛教经典进行取舍与改造,他说:“从文学的角度看,古代黄河文化中富于想象力的小说可以说是没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也很缺乏。幸好中途投到一个外来户,就是那经由佛教介绍过来的南亚次大陆

①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卷一三《翻译文学与佛典》,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6—3807页。

② 陈寅恪:《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7页。

③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275页。



文化。中国文化……在吸收的过程中,逐渐使之汉化即本土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血肉。”<sup>①</sup>另有普慧《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sup>②</sup>、李鹏飞《汉译佛典与六朝小说》<sup>③</sup>等论文,各有新见。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学者对佛经文学性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侯传文《佛经的文学性解读》从启悟文学的角度解读佛经,并推而论之,认为:“中国启悟文学的发展有两条线索,都与佛教有关。其一是僧传文学。……汉魏时期已有个别译家和名僧的传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梁慧皎的《高僧传》。继此之后,历代都有同类著作产生,而且越来越详备。……第二条线索是由讲唱佛经发展起来的说唱文学。”<sup>④</sup>其他的专著还有:孙昌武《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佛教与中国文学》,陈引驰《大千世界——佛教文学》,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吴海勇《中古汉译佛经叙事文学研究》等等。

### 三

中古时期,中国古老的神仙学说、方术在道家理论的支持下,发展为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道教。鲁迅有言:“前曾言中国根底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sup>⑤</sup>道教的形成吸收了原始宗教如巫教、神仙家等内容,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道教对文学的影响保留了原始宗教的诸多特点。学者在研究道教对中国叙事文学的影响时,总避开开谶纬学说、巫教与鬼神崇拜等因素。因此,较之佛教而言,道教对文学影响的独立品格不是很强。道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力也远没有受到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正如葛兆光所云:“人们往往不公正地忽略了道教在中国文学艺术中的影响。”<sup>⑥</sup>这种现象在当今学界开始得到改善。

① 白化文:《三生石上旧精魂——汉文学对通过佛教经典传来的古代南亚次大陆文学素材的使用与扬弃》,《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② 普慧:《佛教对六朝志怪小说的影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③ 李鹏飞:《汉译佛典与六朝小说》,《中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4期。

④ 侯传文:《佛经的文学性解读》,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0—61页。

⑤ 鲁迅:《致许寿裳》,《鲁迅全集》卷一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53页。

⑥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68页。